

“功臣号”驾驶员的奇人奇事

闫树军

人民军队的第一辆坦克

董来扶是山东诸城人,1929年9月出生在一个贫苦农家。13岁那年,他只身一人来到沈阳,在一家日本人开的钢材株式会社当整理工。

在工厂里,董来扶勤奋好学,修理技艺日渐精湛。因天天和日本人打交道,也学会了一些半生不熟的日语,日后,这两样都派上了大用场。

1945年8月,日军宣布投降,东北人民自治军司令部干部高克潜行进驻沈阳。10月,17岁的董来扶参加革命队伍,给高克当警卫员。

11月中旬,高克在沈阳原日军坦克装配修理厂侦察时,发现了保存较完好的日式坦克,立即向自治军副司令员吕正操作了汇报,并主动要求带人去收缴坦克。

吕正操副司令员同意了董来扶的请求。尔后,高克带着董来扶等几名战士隐藏在工厂周围。董来扶向高克请战:乔装去侦察,寻找机会,把坦克开回来。

高克对董来扶千叮万嘱咐:一定要注意安全。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暴露,不能白白牺牲性命。还有,这辆坦克关系到我军坦克史上“从无到有”的突破!只有把这辆坦克开回来,我们才算取得胜利,才是成功!

接下来的几天里,董来扶穿着一件破棉袄,戴着破礼帽,一身土不土、洋不洋的打扮,在修理厂附近转悠。很快,凭借他那满脸的憨厚,再加之几句半生不熟的日语,董来扶混进了修理厂,并在工厂内中国修理工的帮助下,和几个日本修理工也混熟了。

这是个国民党军控制的工厂。国民党军每天监督抢修坦克。“修好坦克,就放他们回日本”的口头承诺,给几个日本修理工带来盼头,所以这几个日本修理工很下功夫。几天后,一个日本修理工咧嘴笑着说:“坦克修好了。”

董来扶听到这一消息后,心里甚喜,急忙将这重要情报向高克作了汇报。

高克马上召开会议,进行战前准备,目标就是把修好的坦克“抢”出来。他们周密策划,反复推演方案,研究各种可能突发的情况和应急处置方案。

高克和董来扶在工厂内中国修理工的帮助下,混进工厂,两人佯装试车,爬上那辆修好的坦克。他俩发动坦克后,先在院子里转了几圈,守卫并未提防。突然,高克一拉操纵杆,加大油门,向大门冲去。敌人发觉不对劲,惊慌开枪射击,坦克如猛虎下山,迅速地往门外冲,想关门的几个国民党军被撞得飞出老远,坦克吼叫着破门而出。

高克和董来扶将这辆坦克开到预先联系好的场院,用谷草掩盖起来。

11月28日,上级指示向通化地区转移。行至沈阳郊区小轿子屯时,坦克发生故障,难以前进。高克为确保这辆坦克能派上大用场,积极与上级和兄弟部队取得联系,等待接应。

此时,延安炮兵学校已抵达沈阳。炮校校长朱瑞一到沈阳,就指定孙三、刘大祥专门负责收集日军遗弃坦克。在得知高克受困后,立即派遣刘大祥带一个警卫排前来接应,高克和董来扶最终将这辆坦克安全地开到沈阳东郊炮校驻地马家湾子。

这是人民军队的第一辆坦克,董来扶也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一批坦克驾驶员。

“老头车”差点被毁

1946年冬,坦克大队全部转移到通化。就在这个时候,在通化发生了残余日伪人员叛乱事件:2月3日凌晨4时,万余名日本关东军发动了武装暴乱,计划一举拿下通化。

因为暴乱前夕我地下党就获悉了情报,于是将一些关东军指挥官秘密关押了起来。后来,关押地点被泄露,日军围攻关押地点。危急时刻,我方守卫人员将关押人员进行紧急处置,防止局势恶化。

这天,董来扶在车库门口看到一个日本俘虏正与警卫战士争吵。起因是日本俘虏谎称接到命令,让他去发动坦克。警卫战士坚持说,他没有接到命令,任何人都不能进车库。

董来扶见此,将计就计说:“上级命令,坦克不发动了,跟我到队部走一趟。”在队部,董来扶向高克轻声耳语几句。高克一听,喝令到“搜!”

董来扶箭步上前,在日俘虏左上角发现一个折叠得很小的“物件”,展开一看,是一块用降落伞布做的白长方巾,上写“队长”两个字,下面有一行日文。董来扶和高克队长正在看日文时,这个壮实的日本俘虏猛地冲上前,对准他俩胸前各击一拳。两个人毫无戒备,被这突如其来的一拳,打了个跟头。日军俘虏乘机夺门而去。

院内响起了急促的紧急集合哨,解放军战士迅速拿下这个日本俘虏,又直奔日本俘虏的住处。在日本俘虏的住处,董来扶发现一个枕头下面露出一个白色的布角,取出来一看,正好和日本俘虏钱夹里的白色长方巾一样,只是上面写的是“队员”而不是“队长”。

解放军战士把其他人员的被子一掀,发现每个人的被子下都有一块白布,原来是国民党地下武装想串通日本人搞暴动,炸毁我军的坦克和武器。白长方巾是暴动时的袖章。“队长”和“队员”是暴动时的官衔,当时他们正在屋内等待暴动的信号——电灯三灭三亮。

突击审讯时,一个日本俘虏说有6枚手榴弹已经装进了坦克。董来扶听到后,发疯般地跑向车库,果然在坦克里找到了手榴弹!

“坦克就是我的命根子,我的犟脾气上来了。从那之后,我就和坦克吃住在一起!”回忆起往事,董来扶说。

董来扶加入革命队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抢”坦克。锦州战场上,董来扶驾驶“老头车”立下赫赫战功,被写进了《东北装甲兵战史》。打天津,董来扶开着“功臣号”,再立大功。参加开国大典,接受毛泽东主席检阅,他和“功臣号”一起,名扬天下。抗美援朝的马良山战役,董来扶亲自指挥,英军王牌败在了他所在坦克连的炮火下。



1949年10月1日“功臣号”驶过天安门

“老头车”成为“功臣号”

1946年4月初,吉辽军区所属部队及第7师包围了长春。长春之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作战史的起点。

1947年10月初,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发出命令,以战车大队为基础扩建战车团。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组建的第一个战车团。

由坦克大队到战车团,董来扶一直没有离开那辆“抢”来的坦克。因这辆坦克无编号,型号老,且多处有“伤”,常出故障,所以当时就给这辆坦克起了一个外号,叫“老头车”。但在董来扶眼里,这辆坦克就是“铁宝贝”,对它细心呵护。在冬季,为了防止坦克发动不起来,董来扶每次战前都先在坦克里燃起炭火,用来保持温度,确保一次就能发动坦克。由于坦克室内空间小,他每次都被熏成个黑人。用他自己的话说:“真是掉进煤堆里,不刷牙就找不着人”。

正是他对坦克的精心保养,始终让坦克保持良好的战斗状态,从而使他在锦州攻坚战上,立下功劳。

打锦州是我军坦克首次参加的大规模城市攻坚战。我军战车团以15辆坦克配合步兵,强攻国民党范汉杰集团10万大军固守的锦州。

1948年10月14日10时45分,总攻开始了。坦克引导步兵前进。敌人的炮弹密集地向坦克袭来。但坦克手们毫不畏惧,经过实战历练的董来扶,驾驶着“老头车”不断变换行进路线,急速地走出“之”字形,一次又一次躲过了敌人的炮火。在总结这次战役时,董来扶写道:

北平和平解放的文本协议签订后,刚刚进行完修整的“功臣号”,接到了新的任务:担任北平外围防御,参加北平和平解放入城式。

2月3日,“功臣号”参加了北平入城式,其铁甲雄威驶过东交民巷。

3月25日,“功臣号”参加了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进入北平的当天在西苑机场举行的阅兵式,接受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检阅。

“一切都是机密的。最初并不知道是参加开国阅兵。但参加重要的庆祝活动是知道的。”“参训之初,我就和战友们一起把坦克从里到外清理得一尘不染,又从上到下喷了一遍油漆。随着训练的工作量加大,特别是整团坦克的合训,加之单位学习文件,知道新政协筹备会召开。再后来,任务就非常明确了,参加开国大典。”董来扶对这一切记忆深刻,回想往事,满脸幸福。

整团进行合练,是在卢沟桥下。任务重,时间紧,这时的训练强度很大,通常是从黎明到黄昏,就在卢沟桥下的河滩里紧张训练。当时的卢沟桥,河滩内到处是黄沙,经常刮风,“训练时,就在河滩训练场吃饭,小米干饭或馒头,饭里都是沙子,挑都没法挑,馒头一咬就‘嘎吱嘎吱’直响。”吃住条件差能克服,保持阅兵阵型也不难,最让坦克驾驶员头疼的是

敌人的枪弹、炮弹密集地连飞鸟都难通过。冲锋的步兵纷纷倒在血泊中,我心里像刀割一样。关键时刻,我驾驶的那辆“老头车”也掉到沟里,车底被东西卡住了。坐在车里的指导员陈明急了,大声喊着:“董来扶你不把车开出来,我毙了你!”

由于敌军炮火猛烈,“老头车”5次发生故障,董来扶冒着敌人的炮火,钻出了坦克,排除了车底障碍,驾着“老头车”冲了上去,炮手几炮便把东面城墙的碉堡全部摧毁,步兵蜂拥而上。

在城内的巷战中,敌人的一门37战防炮从后面连发两炮,其中一发炮弹打中“老头车”,指导员陈明的手指被炸掉一个,炮塔钢板被打了几个小洞,机油箱也被打漏了。董来扶见此急将坦克原地转了180度,一炮就把敌人的战防炮送上了天。

董来扶抢修好坦克,又继续前进。快到火车站时,他看到步兵又倒了一片。原来,火车厢是敌人的活动暗堡,机枪子弹是从那里射出来的。董来扶沉着冷静,与炮手配合,仅两发炮弹就干掉了敌人的活动暗堡。随后又干掉敌人三个地碉和一个炮楼。打炮楼打出了经验,一炮打腿,一炮打顶,一下子就解决战斗,董来扶时常津津乐道地回忆这段故事,并取名为“多快好省”打炮楼。

董来扶驾驶“老头车”在这次战斗中,还单车深入,一直冲到了范汉杰的司令部,几炮过去,敌人就举出了白旗。“老头车”在老城内整整打了一圈。

战后,团首长夸董来扶坦克开得好,董来扶笑着说:“开不好,指导员要枪毙我。”一听这话,大家笑得合不上嘴了。在《东北装甲兵战史》中记载了董来扶和他的“老头车”:锦州战役,董来扶驾驶“老头车”,从冲击铁桥、激烈巷战到老城攻坚,连续作战,“老头车”5次“负伤”,全车乘员英勇顽强,孤兵作战,机智果敢,边打边修,掩护步兵全歼老城一万守敌。

此战,董来扶荣立一大功,他驾驶的“老头车”由第四野战军司令部政治部命名为“功臣号”。

辽沈战役后,东北战车部队稍事休整后即随野战军主力入关。董来扶和他驾驶的“功臣号”随部队南下,参加了天津攻坚战,这是我军解放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坦克攻坚战。

1949年1月14日10时,解放天津的总攻开始。

15日早晨,正在准备进攻的“功臣号”遭到敌人的一发炮弹袭击。董来扶凭着经验判断,是直瞄火炮打出的,这种火炮对坦克伤害很大。但此时,董来扶毫不犹豫地开着坦克冲了上去,集中火力把敌人海光寺指挥所轰炸成一片废墟。各路大军在坦克率领下会师金汤桥,并将天津分割数块。在距敌人200米左右的地方,我军再次被困,敌人两个地堡射出的子弹打在坦克甲板上,把步兵压制得难以进攻。“功臣号”再次冲上前,几发炮弹炸哑了这两个火力点。

天津突破,“功臣号”全体人员荣立一等功,董来扶再立一次大功。《东北装甲兵战史》中对坦克一师的前身——东北战车团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天津攻坚战,是解放战争期间使用坦克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也是坦克与步兵、炮兵和工兵协同作战组织最好的一次。坦克兵的参战,明显地增强了整体的突击威力,把解放军传统的攻坚战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开国大典受阅

董来扶率先驾驶着“功臣号”驶在坦克方阵最前面。

坦克手们相互鼓励、相互加油又相互提醒,大家都想多看一看毛主席。这一想法的涌动,坦克就有了一点向右,朝着天安门城楼方向偏移。站在董来扶肩膀上的擎旗手,马上用力踩了一下左脚,给董来扶提示:偏右,要注意往左来一点点……

也就在“功臣号”出现在天安门门前时,9位摄影师不约而同地对这辆立下战功的坦克进行拍照,为历史留下永远的红色经典。

幸福往往不期而至。如果说,在开国大典阅兵式上,董来扶是在坦克内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那么在1950年9月则是最近距离的接触。25日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董来扶被授予“坦克战斗英雄”称号。作为装甲兵的代表,董来扶在会议后的宴会上向毛泽东敬了酒,毛泽东那慈祥的笑容,深深地烙印在他的脑海中。

走向胜利

抗美援朝战争时,董来扶担任坦克二连连长。

马良山战斗是解放军装甲兵史上的一个辉煌战例。多年后,董来扶依然记忆犹新:“马良山战斗前,我回国参加1951年国庆观礼。战斗打响后,我才赶回连队。开始是副指导员柴景琛指挥,后来我参加了指挥。”

马良山位于朝鲜涟川西北,距津江4公里。这座山有3个鼎立的高峰,形如马蹄,地势险要,是双方必争之地。

马良山被志愿军先行占领。英、美两军每天以近两个团的兵力对马良山进行多梯队的轮番攻击,每天发射炮弹3万多发。

由于寡不敌众,马良山和高旺山地区的防御阵地199.4高地和238高地失守。随后207.5高地、高旺山主峰东侧的无名高地也相继失守。10月4日,高旺山主峰354.9高地、227高地又失守,敌人直逼马良山。

10月5日,敌我双方争夺马良山的战斗打响了。敌人在3个小时的炮火攻击后,又用一个加强团的兵力,在50余辆坦克、40余架飞机及炮兵的火力支援下,向我军连续进攻……在6天的激战中,马良山经过了失守、夺回,再失守、再夺回的反复争夺。虽然中国人民志愿军歼敌2000多名,击落击毁敌人飞机20多架、坦克6辆,缴获了敌人大量的枪支弹药。但还是在英、美两军联手强攻中,由英军皇家苏格兰团占领了马良山,志愿军一时处于被动局面。

危急时刻,上级命令董来扶任连长的坦克二连和坦克四连,配属六十四军一九一师一个团,反攻马良山。

在马良山主峰防守的是英军皇家苏格兰团一营,这个营的营长曾转战日本、法国、德国和非洲战场,作战经验十分丰富。占领主峰后,这个营长命令部属构筑了由明碉暗堡组成的多层地堡群,前沿设有10米宽的铁丝网,以及由手拉雷、脚踏雷、照明雷构成的混合雷场。

11月4日下午3时,总攻开始。志愿军两个坦克连掩护步兵冲向主峰。坦克兵把第一排炮弹送上敌阵地,敌人占领的216、280、



董来扶

317三个高地应声腾起浓烟,其工事和地堡被击中达90%以上。坦克火炮攻击15分钟后,由步兵轻武器射击。英军以为志愿军步兵已经接近他们阵地前沿,于是纷纷跑上工事阻击。这时,坦克火炮进行第二次火力速射,敌人被炸得血肉横飞,暴露的明碉暗堡也大都被志愿军坦克摧毁。

在第二次火力袭击15分钟之后,英军4个炮群一齐开火,炮弹如狂风暴雨般飞向志愿军坦克。紧接着,13架敌机连续5次向志愿军进攻部队轮番轰炸、扫射,炸弹、汽油弹如雨点般从天而降,二连的两辆坦克被燃烧弹击中。此时,离步兵向主峰发起冲击还差两分钟。董来扶指挥战士们纷纷跳出坦克,拼命扑打大火,炮手始终没有停止射击。

坦克上的大火很快被扑灭,英军残存火力点也全部被摧毁。志愿军步兵按时发起冲击,顺利占领马良山主峰,夺回马良山317高地和216.8高地。英军皇家苏格兰团的500余名官兵的尸体横七竖八地布满主峰,幸存的48名英军官兵则举手投降。事后,在被坦克打垮的碉堡中,发现了英军营长的尸体。

马良山战斗,坦克二连荣立集体二等功,董来扶立了个人三等功。

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功臣号”坦克被列入北京军区装甲兵序列。1959年7月,董来扶护送“功臣号”坦克入藏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并建议把战争中更换的57毫米炮换回原来的47毫米炮。董来扶说:“以历史之真,传历史之实。让世人参观,就应恢复原貌,才能永远记住它为中国革命作出的卓越贡献。”

(本文作者闫树军为北京古都学会影像专业委员会副主任)